



存古开新的古越藏书楼

□ 刘琪

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洗礼和历史积淀,藏书楼的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走出一条从特权到平等、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的道路。1902年,浙江绍兴乡绅徐树兰本着“存古开新”之旨,创建了近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私人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树立了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化私为公,藏书续学,创办公共藏书楼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西学东渐方兴未艾,蛰伏多年,蓄势待发,维新变法思潮逐渐成为时代强音。徐树兰,字仲凡,号检庵,清代山阴人,光绪二年中举,授兵部郎中,封一品官职,因母病致仕还乡,兴修水利,创设义仓,造福乡里,嘉惠桑梓。徐氏受维新思潮影响和西方新事物启发,将务农和教育视作维新之本,认为“广设学校,此诚兴贤育才,正本清源之至计也”。为启迪民智,开拓创新,徐树兰借得山会豫仓公地,于1897年创设中西学堂,同蔡元培于1899年创设养新书藏。在《为呈明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事》中他提到:“策念学堂教授学生,每学不过数十人,或百数十人,额有限制,势难广被,而好学之士,半属寒贱,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例,趋向虽殷,讲求无策,坐是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可见在始建学堂之时,入学人数有限,寒门学子每苦无书,难以实现造就人才、救亡图存的夙愿。徐树兰学习他国经验,“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又必建藏书,恣人观览”,意识到藏书楼与学堂互为辅助,能发挥更好的津逮后学作用,萌生了兴建藏书楼的想法。

据《古越藏书楼章程》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徐树兰“捐银八千六百两,于郡城西偏,购地壹亩陆分”,“建屋凡四层,前三层皆系高楼,分藏书籍,以中层之厅事为阅书所,桌椅器物皆备”,清楚记载了1900年,徐树兰自捐银两在绍兴城西贡院处购地一亩六分建藏书楼,合1067平方米,分为四进二楼,前三进用于藏书,第二进楼内一层设有阅览大厅,可同时供60位读者阅读,并设有一处供读者随意翻阅数种日报。徐树兰将家中典藏的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又不惜费用搜罗书籍,共得书七万余卷,至1902年,古越藏书楼初具规模并



对公众开放,“其乡之人大欢”。古越藏书楼开办经费共32960余两银子,都由徐树兰私人捐赠。回望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藏书历史,私家藏书大多秘藏不宣,藏书家们或将典籍束之高阁,藏而不用,或著书立作,校勘刻印,浩繁卷帙在史海沉浮中旋聚旋散,难觅踪影。徐树兰变“一家之藏”为四方之士“共读之藏”,敞开私人藏书楼的大门,供天下有识之士共鉴,是中国藏书事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正如张謇评价“今先生独捐世舍故,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眷知其子孙必能嬗守而不失,亘千纪万劫而无已也”。古越藏书楼开放的办馆理念,显示其已经成为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公共藏书楼。

汇集古今,兼收并蓄,积聚共读之藏

古越藏书楼建成之时,徐树兰捐出世代家藏的经、史、子、集及一切有用之书,并利用捐银从上海等地购入“所有近来译本新书”,加上“养新书藏”中的一部分旧藏,共襄集书籍七万余卷,编目三十五卷,书籍卷首钤有“古越藏书楼图记”“会稽徐树兰捐”“养新书藏图籍”等藏书章。书楼建成后,为获得社会各界支持以丰富馆藏,藏书楼章程中特地注明“以限于财力,未能完备。有愿出资助益及助益书籍者,均拜嘉惠”,并在捐资购入和赠送的书籍上标明“某某惠赠”字样。依托先进的藏书条件和管理模式,古越藏书楼还开创了“存书”先例,初具知识共享的前卫理念,倡导公众将藏书寄存于此,由藏书楼代为托管,存取自便,后来这批藏书有的退还给了主人,有的由主人转赠后保留在藏书楼。除此以

外,徐树兰后辈仰承其遗愿“认捐常年经费一千元”,用于书楼经营和书籍购置。古越藏书楼多元化的藏书来源不墨守成规,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潮流,各类书籍如群流汇海,典籍益宏。

古越藏书楼的建楼宗旨为“一曰存古,一曰开新”。“存古”既是典籍的保存和流播,也是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而“开新”呼应了当时的经世致用学风,顺应西学东渐的潮流,为兴办实业、发展科学积聚养料。徐树兰在藏书楼章程中阐明,“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做学问不能“详古略今”或“尚今蔑古”,博览古今中外方得贯通。古越藏书楼的藏书特点是古今兼收、中西并蓄,将藏书分为古籍、今籍两部;古籍分为学、政二类,除继承四部分类传统之外,增设“时务”一部纳入政类;今籍分为普通和专门二类,已译和未译的“东西图书一律收藏”。古越藏书楼不忘维新图强的根本,以辅佐教育和培养人才为宗旨,重视时务实业实践,除书籍外,收藏各种图画、学报日报、标本器械等,以备科学研究之需。中国传统藏书文化和近代西方藏书理念在古越藏书楼的藏书体系中交汇碰撞,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得以古为今用,近代进步的科学思想得到推广传播。古越藏书楼“开新”的藏书特色,表明其已经从以藏为主的旧式藏书楼转变为以用为主的新型藏书楼。

融会东西,求新图强,创新管理规章

徐树兰参阅中西各国图书馆管理章程和制度,在藏书分编和藏书

楼管理上大胆创新,展现了难能可贵的革新精神和独步当时的先进理念。徐树兰编写了《古越藏书楼书目》,将古典和新学统一分类著录,适应新学、西学书籍的利用和宣传。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外,增设“时务”一部,将新学之书与“经”并列;后又将新旧书籍融为一体,冲破了四部分类的藩篱,创为学、政二部,开创我国近代图书馆中西文献统一立目的先例,为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引进探路。该书目在分类编目、书目体系、类目名称上皆有创新,充分地揭示了馆藏,系统地描绘了我国传统学术体系向近代科学体系转型的图谱。徐树兰还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为藏书楼设置阶梯式的组织机构和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这份章程共七章三十节,在第四章“管理章程”中规定,藏书楼设立总理、监督、司书、司事、门丁、庖丁、杂役等,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初具图书馆管理体制。第五章“阅读规程”共十五节,占全部章程的一半,悉心为读者着想。藏书楼上午9—11时,下午1—5时向公众开放,凭对牌进楼,对号入座,读者可凭对牌和发书单借阅书籍,在一层大厅阅读,自备笔墨随意抄写,但不能将书借出藏书楼,如有污损需照章赔补。除此之外,藏书楼还能够为读者供应茶水、承办用膳,服务细致周到,体现了开明的读者服务意识。

古越藏书楼开放后,“海内藏书家皆效先生之为”,全国各地办公图书馆蔚然成风。走向开放、融通共享的古越藏书楼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文人学者,蔡元培曾在此校刊图书数年,范文澜在负笈上海浦东中学堂之前,也曾是出入藏书楼的常客,钱玄同、鲁迅、胡愈之等人皆与古越藏书楼有不解之缘。百余年间,古越藏书楼历经磨难,现为绍兴图书馆的分馆之一,绍兴图书馆的历史文献馆中珍藏着古越藏书楼的一万余册旧藏。如今,藏书楼独存门楼两层,仍然对外开放,“存古开新”的历史文脉中,孕育着一方土地的精神共富之魂。悠悠香致远,百年余韵绵长,如蔡元培先生在古越藏书楼所书对联中言:“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学术与治道是历代学人与政治家都关心的话题。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亲历鼎革之变,后隐居山林,发愤著书,晚年写成《宋论》。此书以宋朝的兴盛、衰弱、灭亡为主线,探讨古今兴亡之道,力图从宋朝盛衰转变的历史经验中寻绎政权兴亡的内在逻辑。《宋论》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哲学,也体现了王船山独到的治国思想。

学以择术,术以行学

“不学无术”一词源于东汉班固的《汉书·霍光传》。王船山在《宋论》中提到,北宋政治家张咏让寇准读《汉书·霍光传》,寇准自以为有所领悟,实际上却走上了歧路。王船山借此解释“学术”,“学”有纯有杂,“术”有正有邪,纯正的学问能够让人做出正确的策略,走上光明正大之路。《礼记·月令》中的“审端径术”,《论语》中的“行不由径”,都是让人遵循正道,不走邪路。王船山认为寇准不明白“学术”的真正含义,未能以霍光为鉴,最终罔顾正道,病死他乡。

“正学”而后“慎术”。王船山主张,端正学问在先,选择策略在后,学问与策略互相验证。王船山认为《大学》之道,在于“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与儒家典籍里保存的“正学”一脉相承。伊尹之学,保存在《伊训》里,傅说之学,保存在《说命》里,周公之学,保存在《无逸》里,召公之学,保存在《旅獒》里,都体现着“正学”和“慎术”。用圣贤之学来治国,往小了说,能安顿性命,使人们各得其安;往大了看,能经邦治国,使人们各尽其用;经年累月,能造就和谐,使人们诚心敬意。

学术与治道同条共贯。端正学术,然后有家国之治。王船山认为尧舜的学术与治道直接相关,关键在于“以德为之”。尧舜时天下大治,尧虽“无名”,舜虽“无为”,实际上是实行以德治国的策略所自然而然达到的效果。君子以德为治,就要严于律己,为了端正人心,整顿风气,必有所不为。王船山列举道,淫声冶色、贿赂贪污、剧饮狂歌、放浪调笑,君子所不为;赌博游宴、流连昼夜,君子所不容;结交方外、阿谀奉承、卜卦算命,君子所不受。由此才能辨学术、正人心、善风俗、定纲纪,行君子之道,才是治道之本。

正学成治,真知力行

治国之道,不尚空谈。宋代学术发达,有洛学、蜀学、新学等等,不但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在政治上也影响很大,后来都融入了喧嚣的风气,成为议论治道的谈资。宋仁宗时,文人常常口若悬河、指天画地,闹得政局不得安宁。学术的虚假繁荣实际上造成了治国的混乱。在朝的大臣,常常用骇人听闻的议论耸动人主,颠倒国是,在野的人员常常摇唇鼓舌,炫人耳目。其议论虽旁征博引,往往不切实际,纯属袖手空谈;其文章看似颇有道理,常常迂腐阔达,不能施行。众声喧哗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内心的惶惑。王船山批评说,仁宗一朝“国事不可为矣”,只有把这些文章束之高阁,国家才能有救。

治国之道,不尚清议。自宋神宗以来,清议干扰治国,情形加剧。权臣常以清议互相声援,前有蔡京、王黼、童贯、朱勔,后有吕惠卿、蔡确、章惇,他们前后相继,造成了学术与治道的一并衰败,其影响十分深远。宋朝南渡以后,主战、主和两派的争论从没停止过,清议成为谈论治道的工具。秦桧主和,主战派就批评其丧权辱国;韩侂胄主战,主和派就说其擅权倾轧。但单纯的主战或主和,均为形势所不允许。其结果是,秦桧死后,主战派有符离之败;韩侂胄服诛,南宋无力抵抗,只能坐以待毙。神宗时期,文人用学术互相倾轧,王船山反问道,“天下亦何恃此清议哉?”

治道所在,必须真知力行。王船山认为宋朝的终结,是自从尧舜以来,华夏治国之道的沦丧。王船山告诫说,治国要真知力行,才能“治平天下”。真知力行,就要避免浮华空洞,不崇尚意气之争;真知力行,就要去掉虚荣心理,脚踏实地地办实事。如果崇尚名位、蝇营狗苟,即便是位列三公,也与草莽匹

《宋论》中的学术与治道

□ 王杰 陈吉旭

夫无异,身死以后,只剩下千秋骂名。

必以实情,斟酌制宜

治理之道,必以实情。《宋论》中详细剖析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和政治影响。王船山认为,王安石破坏了政治纲常,也开启了党争;变法措施造成了贪污腐败,对百姓不利;还破坏了人才培养的机制,导致后来无人可用。王船山评价王安石变法虽过于苛刻,但其主张“学有所得,不敢姑试”,却并非没有道理。王船山认为,所谓治国的“定论”,要从“随时处中”出发,求谋划“自求之道”,不偏不倚,扶危定倾,才能行有所成。“随时处中”要求“君子之言有物”,“物也者,实也”,也就是治理之道,必须从实情出发,符合中道、不能偏激,由此才能建立不拔之基、传世之业。

治理之道,必须制宜。治国之道不能违背“天之时”和“民之气”,因此治国的策略不能凭空提出,也不能照搬套用。“思而得之”“学而得之”“行而得之”,都还不够,要考虑周到全面,极尽曲折细微,经得起推敲,才能推行。宋光宗时,朱子做潭州知州,请求实行经界法。经界法“均平详审”,看上去无懈可击,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但最终“卒不能行”。后来贾似道窃用朱子的经界法,实行公田法,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王船山借此要说的,是治国仅靠“思而得之”“学而得之”,是远远不够的。治国的策略,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各种情形而有所斟酌损益,才能落地施行。

经界法也有其历史基础,可以从《周官》《孟子》中找到依据。但三代以前与南宋的社会现实,各方面均有所不同,差别巨大,也就不能凭借远古的理论来进行当下的治理。王船山的政治哲学立场是:“政有成型,而刑必滥”,他反对忽视具体情况的机械模式的“成型”。越是一意孤行,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可见王船山是借历史评断来说明治国之道。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政治哲学。他在通过历史评判来寻找“求治之资”的过程中,也为其政治哲学赋予了近代因素。王船山思想在晚清的传播与兴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上接1版)

一是坚持系统化推进科技金融工作。以高标准建设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建立健全科技金融组织推进体系,省政府成立科创金融改革领导协调小组,组建由19家省级金融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金融专家团,密切与行业主管部门、科技专家、企业家的对接会商,形成省市联动、横向协作、点面结合的科创金融改革工作机制。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打造“科创金融中心+科技金融特色机构+专业团队”多层次特色化科技金融组织体系,银行机构在院建成总行级科创金融中心8家、特色机构64家,开展专业经营团队、专用风险管理手段、专门信息管理系统、专项激励考核、专属信贷标准“五专”服务,以全省1%的特色网点贡

献了近千亿元科技贷款。在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打造科技金融专区,集成数据形成信用评分,累计服务企业29万次,发放信用贷款4900多亿元。

二是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出台制造业融资财政贴息、数字化改造项目贷款贴息政策,对制造业项目最高贴息可达5000万元,对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0%给予贴息,对单个项目每年贴息最高可达500万元,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根据发债企业融资金额给予分段贴息,单个企业每年贴息最高可达300万元,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三是加强科技金融监管和激励约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推动长三角区域金

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协同测试。全省科技贷款不良贷款率0.39%,银行资产质量居全国第4位,金融风险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完善包容审慎监管,探索实施科技金融业务尽职免责负面清单,审计、财政、金融、国资、纪检等部门共同研究健全尽职免责机制和容错机制,明确适度提高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通过加快发展科技金融,安徽科技和产业创新实力持续提升。2023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7位、连续12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高新技术企业1.9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75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97家,分别居全国第8位、第7位和第8位,企业创新活跃度居全国第3位。新能源

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大新兴产业蓬勃发,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先进结构材料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建设,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高地纵深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43%,支撑安徽工业经济规模跃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持续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安徽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安徽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深入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增添金融动能、作出安徽贡献。